

刘小新——著

文化研究 与文学问题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海外借

文化研究 与

刘小新——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与文学问题 / 刘小新著. — 镇江 : 江苏
大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684-0369-6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文集②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6-53②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8311 号

文化研究与文学问题

Wenhua Yanjiu Yu Wenxue Wenti

著 者/刘小新

责任编辑/林 卉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18.5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369-6

定 价/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目录

第一辑

- 003_ 文化研究的激进与暧昧
- 015_ “纯文学”概念及其不满
- 032_ 审美宽容：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 044_ 对象、理论与学术平台——关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思考
- 055_ 文艺的人民性与人民美学再出发
- 066_ “文学基础理论的重大问题研究”述要
- 070_ 现实主义文学问题
- 079_ 后现代主义文学问题
- 087_ 儒学与当代文学理论重构
- 095_ 21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回眸

第二辑

- 111_ 文化研究与台湾批判知识分子的论述实践
- 124_ 文化行动主义在台湾的兴起
- 137_ 当代台湾文学研究中的殖民现代性幽灵
- 153_ 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的民间社会理论与文化论述
- 168_ 《台社》知识社群的问题意识与方法学
- 180_ 台湾传统左翼思想的困境与复苏
- 190_ 后殖民批评在台湾的兴起与演变

202_ “解严”后台湾女性主义思潮与文化研究

214_ 两岸文化交流的瓶颈与障碍

第三辑

225_ 从闽派批评、闽派翻译到新闻学

233_ 文学话语的波长

——南帆访谈录

243_ 小说家林那北访谈录

249_ 微信写作：另一种文学样式

——评《健民短语》

254_ 细碎的光影与历史的图谱

——评钟兆云的《乡亲们》

260_ 勘探“意义的旋涡”

——简评陈舒劼的当代文学研究

264_ 历史意识与现代性的重新打开

——简评林秀琴的文学研究

268_ 介入、对话与批判性阐释

——简评练署生的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

272_ 繁复的话语风景

——简评滕翠钦的学术研究

275_ 福建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研究

第一辑

First

文化研究的激进与暧昧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起成为在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重要现象。文化研究在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文化研究做了什么?存在哪些问题、限制与困境?本文以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为中心展开讨论,试图提供一份初步的观察与思考。迄今,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十种:《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戴锦华著)、《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南帆著)、《在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 年代的文化与文学分析》(王晓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戴锦华主编)、《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包亚明等著)、《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邵燕君著)、《崇高的暧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休闲》(胡大平著)、《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陈映芳著)、《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宋伟杰著)、《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陈昕著)。从批评理念、研究框架和涉及面看,这套丛书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文化研究的中国实践第一阶段成果的集中展示。

文化研究是什么?这或许得从文化研究的西方起源及其流变说起。但看起来丛书主编和作者的兴趣并不在这里,这是另一些学者的工作。李陀们显然不愿把文化研究做成西方理论的又一次愉快旅行的注脚,而把它视为阐释“中国问题”的一种话语实践。文化研究在中国意味着人文知识界重新介入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现实的一次努力和尝试。从“后学”的潮涨潮落到今天看来多少有些空泛的人文精神论争,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焦虑到文学研究的高度体制化、专业化,人文学界似乎丧失了文化参与的现场感和

阐释现实的能力。詹姆逊说: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的确,对于中国人文知识界而言,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专业化纯文学研究的攻击,都是企图重新介入当代文化场域、重获阐释现实能力的愿望表达。阅读李陀主编的这套丛书,我们强烈感受到了这种介入的愿望。借助文化研究,人文知识界有可能再次获得一种介入式的知识位置。在文化研究的名目下聚集起来的这些学者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基本认识,即大众文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现实的重要构成。因而,大众文化批评就成为人文知识分子重新返回文化现场的一个重要入口。

但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并不意味着丛书作者们对大众文化的功能与状况有着相同的认识与理论立场,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差异,甚至产生了相互矛盾、抵触、解构的现象。这种理论立场上的巨大差异与矛盾一方面显示出丛书的丰富性,也意味着9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的复杂性,不同的研究者或许观察到的只是复杂问题的某些面向。但另一方面消解了丛书的批判力量,也暴露出文化研究的内在困境与暧昧。概而言之,这套丛书在理论立场上大体可以分为四种:激进的批判立场;“双重视域”的复杂审视;相对客观的社会学描述;感性与理性的矛盾。

其中批判大众文化的立场以王晓明和戴锦华为代表。在他们看来,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构成部分,大众文化参与了作为社会转型观念基础的新意识形态的建构,而这种新意识形态无疑遮蔽了现实的复杂性与深刻的差异性。这是一种有些新左翼色彩的批判立场。王晓明以解剖现代作家的精神障碍的方式敏感地触及了当代现实的深处,他把“进步”“现代化”“发展”“成功”“市场”“世俗化”“自由主义”和“消费时代”等一系列话语混合而成的“新思想”称之为“新意识形态”:“它事实上已经构成主导今日社会一般精神生活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了。”^①在社会转型中,这种新意识形态产生了新的压抑与遮蔽。文化研究要批判的正是这种“笼罩”人们一般精神生活并且不断塑造公共想象与欲望的新意识形态,尤其要反省知识界对这种新意识形态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与共谋。这里,王

^① 王晓明:《在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19页。

晓明显然把“自由主义”话语和人文科学的专业化倾向视为形塑新意识形态精神资源的构成部分。对他而言,这种新左翼社会批判立场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鲜明。如果从另一个理论高度来看,王晓明对“新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描述可能有些印象化并过于简单了,没有揭示出新意识形态的复杂结构及其生产机制。所以,他从新意识形态批判大步迈向“新富人”和“成功人士”形象批判。这样,批判的焦点缩小了、明确了,但批判的力度与意义却也减弱了。以对“新富人”和“成功人士”想象的感性批判代替对复杂的中国问题的理性分析,这种视域的缩小很难产生真正深刻的思想。所谓的“新意识形态”是否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有没有化约主义的危险?“成功人士”想象在“新意识形态”中占有多大的分量?以“成功人士”想象为中心的“上海想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性的问题?在“新意识形态”批判的视域中哪些问题反而又被遮蔽了?如何评价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欲望”?……这一系列问题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从“中国问题”到“新意识形态”再到“成功想象”和“新富人”批判,如此缺乏中介、快速的话语转换,是否暗示了文化研究在阐释中国问题上的某种限度?许多时候文化研究者还是不得不回到自己原有的专业层面上展开文化研究。跨越学科界限的文化研究可能只是一种愿望。文化研究者的学科背景限制在多大程度上局限了文化研究事实上的跨学科性及其社会批判的力度?文化研究需要突破学科体制的限制,但文化研究者却深陷在学术体制之中。今天的文化研究对这种现实的制约性因素是否缺乏足够的反省?这或许是值得人们反省的问题。

在理论立场上,戴锦华与王晓明是比较相近的,他们都认为大众文化是对现实关系的“遮蔽”。在《隐形书写》一书中,戴锦华将20世纪90年代中国繁复的文化格局称为一处“镜城”。“镜城”是一种结构,也是某种幻象,也可视为意识形态的隐喻。她的“镜城”或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地形图”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是各种权力中心相互冲突、合作与共谋的“共用空间”。为揭示出这一文化地形图的形成机制及其结构,《隐形书写》更多地借助了福柯的知识谱系学与考古学的方法。她对90年代的文化研究有意识地引入了历史的分析维度:对今日文化现实的描述与思考,必须建立在80年代的思想文化史的思考与反省的基础上,也不能回避对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再读与反思,这肯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见解。戴锦华对20世纪80

至90年代几次话语转换的修辞分析细腻而富有启发性。在她看来,知识分子参与的每一次话语实践与转换都是成功的意识形态实践,完成了一次次的“文化遮蔽”: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宏大叙事和“现代性”话语完成了对“文革”历史的放逐与遮蔽,进而完成了对百年中国历史的遮蔽;90年代所谓的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完成对横亘在八九十年代之间的创伤体验的遮蔽;而90年代的大众媒介文化则是对重组中的阶级现实的遮蔽。每一次遮蔽都有使其合法化的一套社会修辞与文化逻辑。文化研究的批判意义就在于揭示出在社会意识形态话语转换与重构过程中发生的遗忘、压抑与遮蔽,也揭开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参与这种话语转换,从而获得话语/文化权力的隐蔽机制。所以,在戴锦华和王晓明看来,文化研究在中国还意味着人文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反省与批判:90年代知识分子通过对“制媒”过程的深入介入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完成经典权力向大众媒介权力的转换。

许多时候,戴锦华对“文化遮蔽”的揭示往往有所发现,也颇为尖锐和深刻。但同时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疑点:历史的转折除了产生“遮蔽”外还发生了什么?“遮蔽”之外的问题会不会都被戴锦华的“遮蔽”论“遮蔽”了?80年代的“现代化”宏大叙事是对百年中国历史的遮蔽还是百年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如果回到百年历史的戏剧场景中,“现代化”事实上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冲动。或许应该追问的是现代化叙事遮蔽了百年历史中的什么问题?80年代的“现代性”话语是对“文革”历史的放逐与遮蔽,还是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否定与颠覆?作为“现代性”话语核心的“主体性”论述以及“人性论”“人道主义”“自我”“唯物主义实践论”“感性解放”“回到文学本身”等一系列启蒙话语无疑具有反思“文革史”的意义。社会历史及其思想文化史的转型可能远比所谓“遮蔽”复杂得多。在“遮蔽”的同时,是否也产生了“反遮蔽”?“反遮蔽”是否也可以借助文化修辞隐蔽地突破各种政治禁忌?90年代大众文化生产的主要是“中产阶级”想象吗?这样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与大众文化的现实相吻合,显然还需要更多实证资料的支持,传统社会学的缺席或许是人文科学取向的文化研究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缺陷。

南帆总是想把问题看得更复杂一些。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戴锦华和南帆对女性的“看与被看”问题有着不同解释:戴锦华认为女性/女性文学长期被置于“被看”的位置上,意味着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这是一种颇为流行的

女性主义观点;而南帆则提出在大众传媒时代,女性的“被看”有可能形成一种特权阶层,这样在性别理论分析之外引入阶级理论及种族范畴,“看与被看”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南帆认为文化研究在阐释中国问题时需要充分关注这种复杂性,无论是德里克的“地域”还是詹姆逊的“第三世界”,都“过于单纯了”。“如果进入地域或者第三世界内部,问题就会骤然地复杂起来。民族、国家、资本、市场、文化、本土、公与私、诗学与政治,这些因素并非时时刻刻温顺地臣服于某一统一的结构。”^①在《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中,南帆强调从“双重视域”具体考察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在互相对话论辩中勘探电子媒介文化的价值坐标:一方面,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不仅为大众制造了巨大的欢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与更进一步的民主与开放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电子传播媒介在民主的背面存在强大的控制,在解放之中掩藏着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因为大众文化的快感政治具有启蒙与操纵、解放与控制、规训与反规训的双重特性,所以在南帆看来,今日的大众文化研究需要的不是立即做出否定或肯定的判断,而是具体的分析和展开,从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现为一种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现为一种控制。南帆关注的重心是电子传播技术的变化对日常生活、文化形式乃至政治形式的深刻影响,他始终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影响的双重性。由于始终强调这种复杂性,南帆显然不属于戴锦华、王晓明式的带有激进色彩的文化批判学派。在理论立场上,很难把南帆编入“新左翼”或“自由主义”抑或其他什么阵营。当然,南帆的“双重视域”常常有些不平衡。在分析大众文化启蒙与操纵的两面时,其论述的重心往往向揭示“操纵”方面倾斜。这种倾斜显示出南帆所处的批判性知识位置。

“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在理论与方法上显然存在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与人文科学取向的分野。陈昕的《救赎与消费》、邵燕君的《倾斜的文学场》与陈映芳的《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都属于社会学取向的文化研究。黄平在《救赎与消费》一书的代序中说:“社会学研究不一定非要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总是处于批判位置或采取批判的姿态。我们如果有大量的、长期的观察和研究,能把困难和难题显现出来,能把里面的制

① 南帆:《问题的挑战》,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约的因素揭示出来,那贡献就是不小的了。”^①但黄平同时认为批判的视野是必不可少的。《救赎与消费》一书在大量的经验材料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看似有些分量的结论:消费主义在中国城乡的蔓延并不必然与经济因素相关联,而是更多地由“文化—意识形态”所主导。这里隐含了一种黄平所说的“批判的视野”——消费主义通过符号象征意义生产并控制了当代社会的“需要”与“满足”。陈昕的野心似乎太宏大,他所研究的课题是“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但其实证研究所占的分量很难支撑如此宏大的企图。作者把消费主义在当代中国城乡的流行处理成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却或多或少忽视了地区、年龄、阶层、性别、教育背景以及收入状况的差异对消费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今天把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截然分开如何可能?“文化主义”倾向的消费研究的限度是否需要反省?陈映芳在《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一书中描述并分析了20世纪中国青年文化的几个世代的流变,有些“概论”的味道。如果选取某一时期的青年文化做更详尽、深入、系统的研究,或许更有参考价值。相比而言,邵燕君的《倾斜的文学场》在选材上要小一些,讨论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作者对经验材料的描述多于分析与阐释,讨论的是“文学场”的倾斜,但却没有描述出“文学场”的结构。

如果说《倾斜的文学场》小心翼翼地回避理论,把文化研究做成了一种经验的描述;那么宋伟杰的《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则动用了大量的理论资源分析金庸文本、解释“金庸现象”,其中主要以詹姆逊和保罗·利科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论述为立论基础。詹姆逊和保罗·利科都认为大众文化具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相互关联的两面,乌托邦的“超越性功能”构成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宋伟杰的核心观点是:金庸的“江湖”与“武林”想象建立了一种“乌托邦主义”,而金庸所提供的江湖乌托邦及阅读金庸所产生的乌托邦感受,含有对现实批判与救赎的意义。有趣的是,一个十分欣赏、推崇金庸的学者如何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研究?如果趣味销蚀了距离,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如何可能?宋伟杰无疑是一位深度的“金庸迷”,因为在

^① 黄平:《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代序)》,陈昕:《救赎与消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代序第14页。

这部有深度的金庸论中,处处可见作者对金庸的赞美:金庸“在镣铐的束缚下成为一个美妙绝伦的舞者”。“金庸及其小说似乎始终是个‘例外’!”“金庸小说有着巨大丰富性!”“博大精深的金庸小说融武侠、言情、侦探、历险、政治以及广义的幻想小说于一身。”“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在评价莫扎特的音乐时,有一句也许他自己也颇为得意的妙语:‘凝重者轻盈地漂浮着,而轻盈者无限凝重地摇曳着’。金庸小说亦复如是。”……作者有时甚至用抒情代替分析,以表达自己阅读金庸时那种“神秘、抒情,略带苍凉而又不失欣悦”的“浪漫幻想”与“孤独体验”。在趣味的力量强大到左右理性时,作者把关于金庸的文化研究做成了金庸的赞美修辞学或辩护词,从而放大了大众文化乌托邦对现实的批判与救赎作用,而遗忘了它对人的心智的麻醉功能。而在理性的力量超过趣味时,宋伟杰显然有了更有价值的发现:“江湖世界所构成的是一面既压抑又强化主体意识的镜像。”金庸小说的“政治修辞倾向于淡化或者瓦解‘华夷之辨’,而文化修辞却暗中凸显了‘夷不胜华’的内在旨归”。^①

以“上海酒吧”为文本讨论现代都市的空间生产、消费与想象,在这套丛书中,包亚明等著《上海酒吧》在选材上显得十分独特,内容包装也有些新潮。该书导论提出了“上海酒吧”研究的四个纬度:(1)消费空间与公共领域;(2)娱乐版图的扩展与地域性知识的重建;(3)巨型城市、全球城市语境中的国家与资本;(4)城市镜像与“上海精神”。以如此巨型的视域进入酒吧研究委实是前所未有的。这可能代表了文化研究朝时尚化、商品化方向迈进的一种趋势,反抗学术体制的文化研究被更加强大的市场体制收编不是不可能。《上海酒吧》的作者们当然知道“批判性视野”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因此,书中出现了不少已经离“上海酒吧”很远、看起来很“深刻”的理论阐释。而一些对谈与议论不是建立在严谨的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显得晦涩、随意、暧昧,仿佛是发生在酒吧里的哲学闲谈,如“酒吧文化所体现的官方政治权力与个人性、民间性的对立和血肉冲突方式也是特殊的……以个人性的话语抗衡社会性的欲望,可能会构成今后酒吧文化的内在冲突”。^②这种对文本的过度阐释在时下的文化研究中并不少见。在《上海酒吧》里,我们常常可以

① 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② 包亚明,等:《上海酒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发现小资情调或中产阶级趣味与知识分子批判理性之间游离的症候。作为“感觉与情调”的酒吧与作为文化批判文本的酒吧之间的游离和断裂,使关于“上海酒吧”的文化研究在立场上产生出某种有趣的暧昧和矛盾。

这种理论立场上的矛盾分歧与互相抵触还不是当前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许多迹象表明,文化研究者对文化研究阐释复杂的中国问题的限度缺乏必要的反省。丛书的主编和作者们一再表明文化研究的核心工作是阐释“中国问题”,文化研究是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和理论追索,王晓明甚至认为必须从重建当代中国整体认识的高度来讨论进行文化研究的迫切性,“说文化研究在今天具有迫切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指一切经济、生态和政治的变化都必然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形式,而更是说,如果缺乏对90年代的文化状况的深入分析,你甚至都很难把握那些经济、生态或政治层面的复杂变化”。在这些学者看来,“跨越学科界限的文化研究”在阐释复杂的“中国问题”上似乎有着强大的能力。这显然是过度高估了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作用。的确,“中国问题”是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交缠,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的结构性问题,以大众文化批评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可以成为一个阐释的维度,但经济与政治问题仍然是首要的问题,单纯的文化研究显然不可能达到对当代中国整体认识的高度。那种认为只有通过大众文化批判才能把握“经济、生态或政治层面的复杂变化”的观点,如果不是一厢情愿的学院知识分子的天真,那么就是一种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批判姿态。从西方到中国,许多文化研究者都把揭示大众文化对社会现实的遮蔽视为首要问题,文化成为斗争与反抗的主战场,而回避或忽视了经济和政治资源分配与再分配的面向,因而在激进批判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缺乏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的文化研究即便是激进的文化批判,也是软弱无力的,甚至不可能有效地阐释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而只是学院内部的话语政治或走向其反面,成为大众文化商品的一部分。

文化研究的软弱无力与其所依赖的批判的思想资源直接相关。李陀在该丛书的总序中呼吁“逐渐建立适应现代中国情况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应对社会转型对人文科学所提出的挑战。但从该丛书所提供的成果看,距离戴锦华所提出的“寻找并积蓄新的思想资源”的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从总体上看,他们进行文化批判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

兰克福学派或者伯明翰学派,以阿多诺、葛兰西或者列菲伏尔等为代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阐释中国问题上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因为他们的现代性批判所面对的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交错的“中国问题”则要复杂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阐释中国问题,显然还是一个需要深入反省的课题。中国目前的文化研究对如此明显的问题却缺乏充分的反省。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关注不够的文化领域开辟了批判的战场,着力揭示大众文化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但同时却放弃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践唯物主义与总体范畴。本质上它仍然属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批判传统。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然是软弱无力的,也不可能整体地认识当代社会现实。从李陀主编的这套“大众文化批评丛书”所援引的资料看,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批评被西方理论所支配的状况在当前的文化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不同的是,在9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文化工业论述左右着中国学者的大众文化批评——如徐贲所言,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甚至形成了一种流行甚广的“阿多诺模式”,丰富复杂的大众文化现象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旅行途中的中国风景;而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文化研究虽然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模式”一统天下的格局,但还没有超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框架。因而表面上看文化研究似乎热热闹闹地回到了文化现场,但却没有真正返回到“中国问题”的脉络上,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的文化研究热只是又一次“翻译的思潮”。由于受到思想资源方面的限制,丛书的中心观点即大众文化遮蔽了社会重组中的社会分化现实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思想含量,因为这种现实在日常生活中太容易被“发现”了。如,在“主旋律”电视剧或者春节联欢晚会中找到主流意识形态也并不困难,而在上海酒吧中发现个人话语与社会欲望之间的文化冲突则只是精英论述与流行时尚的一种后现代式游戏拼贴。

当今的文化研究显然难以达到马克思那种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高度。由于受后现代主义与解构思潮的隐蔽影响,文化研究普遍怀疑总体性思想并力图解构宏大叙事,也提不出更有效地阐释中国问题的新理论框架和更好的社会文化发展方案。王晓明认为文化研究要“为别

样的前景想象贡献资源”,戴锦华也说文化研究意味着“寻找‘另一个故事’的理论与实践之路”。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所谓“别样的前景”和“另一个故事”到底指涉一种怎样的图景?文化研究在批判的背后试图捍卫的究竟是什么?王晓明把它确定为“不依赖效率”并“高居利益之上”的价值,即“诗意和美的感动”或者“真正的创造性、多样性、深度与美”。这些的确是具有普世意义的美好价值,也是一种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抽象的文化观念。文化研究原来的意图是介入当代现实生活,但支撑文化研究的信念基础却是超越现实的“诗意与美”。在王晓明的正面阐释中,文化研究暴露出了德国浪漫派美学的底牌——文化研究变成了以诗意与美反抗异化的浪漫哲学的当代中国版。马克思与卢卡奇(又作卢卡契)曾经扬弃了的席勒的那种审美主义幽灵又潜入了文化研究场域中,如同卢卡奇所言:审美主义“意味着回避真正的问题……并把‘行为’一笔勾销”。^①当“介入”蜕变为“审美超越”,文化研究的政治意义也就自我消解了。早在1989年,梅铎就指出文化研究如果还要保持知识分子的活力,就应该介入公共事务的实践,与政策制定者对话、公开演说,因为公共空间正面临制度性的危机。^②

在当代中国富有批判精神的文化研究中,我们很难找到真正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知识图景与愿景想象。这或许是一个普遍性的人文难题。当今之文学、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都面临这一困境。南帆在评论韩少功90年代的散文时曾经指出了这一现象:“韩少功想肯定什么?这远不如他的否定对象明晰。当然,我指的是那种生存能够赖以支撑的肯定。这种肯定凝聚了人们的信仰和崇拜,并且以第一大前提的名义派生一系列信念。质言之,只有这种肯定才是抒情和诗意的最终根源。尽管否定的同时也反衬出了肯定,但反衬出来的肯定往往闪烁不定,隐约其词,甚至彼此矛盾。它缺少一种正面的强烈之感。”^③批判的文化研究同样缺乏“正面的强烈之感”,如果要摆脱软弱无力状态,就必须寻找到其赖以支撑的肯定性力量和更丰富的思想资源。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5页。

② 李政亮:《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批判与对话》,《文化研究月报》,2003年6月15日。

③ 南帆:《诗意之源——以韩少功20世纪90年代散文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